

經濟社會學觀點下的「台灣奇蹟」： 現象、重新概念化與另類可能

謝國雄*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以最近出版的《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作為楔子，本文藉此檢視台灣經濟發展的各種概念與論點，並探索其與資本主義和經濟社會學的關係。本文首先指出本書的貢獻，並從現象、全書鋪陳，以及概念與理論層次來與本書切磋，之後則從「台灣經濟發展」的各種故事（論點）來定位本書導論章〈「台灣製造」的崛起與失落：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經濟社會學〉的「未竟的奇蹟」之衰退論。本文接著提出另類觀點，借鏡調節學派對戰後西方資本主義「黃金時期」的研究成果發展出來的積累體制（accumulation regime）與調節模式（modes of regulation）的觀點來檢視這些故事，嘗試以「外包積累體制」與「純勞動調節模式」來掌握台灣經濟發展史的特徵，並指出本書各篇論文在這個觀點下的貢獻。最後，本文汲取經濟社會學晚近的「文化轉向」（the cultural turn）與「實作轉向」（the practical turn）的洞識來尋求超越調節學派之道。

關鍵字：經濟發展、資本主義、積累體制、調節模式、經濟社會學

台灣社會學第 37 期（2019 年 6 月），頁 99-130。DOI: 10.6676/TS.201906_(37).04
收稿：2018 年 5 月 21 日；接受：2019 年 3 月 22 日。

* 通訊地址：11529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Email: etshieh@gate.sinica.edu.tw

The Taiwan Economic “Mira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Sociology: Phenomena, Reconceptualization and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s

Gwo-shyong Shieh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After briefly reviewing the recently published *Unfinished Miracle: Taiwan's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ransi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different conceptions and stories of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capitulates it a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Enlightened by the regulation school, informed by the golden age of capitalism from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o the 1970s, this paper employs the concepts of the “subcontracting accumulation regime” and “labor-only modes of regulation” to grasp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Taiwan.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essays collected in *Unfinished Miracle: Taiwan's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ransition* are then highlighted anew. It is recommended to learn from the cultural turn and the practical turn of economic sociology to go beyond the heritage of the regulation school.

Keywords: Economic development, capitalism, accumulation regime, modes of regulation, economic sociology

台灣戰後蓬勃的經濟發展被稱為「台灣奇蹟」，是國內外學術界探討的焦點。最近出版的《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以下簡稱本書）檢視了1990年代之後的台灣經濟發展，重新探究「台灣奇蹟」，指出這個奇蹟已經是強弩之末，是「未竟的奇蹟」（李宗榮、林宗弘 2017a）。此書的出版回應了台灣社會對於台灣的經濟與社會何去何從的焦慮，迅速地獲得熱烈的迴響，展現了這本書的社會影響力。

本文將以這本書作為楔子，藉此來檢視台灣經濟發展各種概念與論點，並探索其與資本主義發展及經濟社會學的關係。全文分成六個部分：（1）指出本書的貢獻，並從現象確立、全書鋪陳，以及概念與理論層次來與本書切磋；（2）從「台灣經濟發展」的各種故事（論點）來定位本書的「未竟的奇蹟」的衰退論；（3）借鏡調節學派對於戰後西方資本主義「黃金時期」的研究成果，以「積累體制」（accumulation regime）與「調節模式」（modes of regulation）的觀點來檢視這些故事；（4）嘗試以「外包積累體制」與「純勞動調節模式」的運作與變遷來掌握台灣經濟發展史的特徵；（5）指出本書各篇論文在這個觀點下的貢獻；（6）汲取經濟社會學晚近的「文化轉向」（the cultural turn）與「實作轉向」（the practical turn）的洞識尋求超越調節學派之道。

一、楔子：奇蹟的興與衰？

（一）貢獻：初瞥

整體看來，本書各篇論文做出了幾個重要的貢獻。首先是偵測出台灣晚近的經濟與社會變遷，並試圖找出其中的原因，如國家角色的轉變與弱化、企業的大型化、台資外移中國等。其次，本書很明確地將台灣定位在全球化的進程之中，如：在筆記型電腦業中的全球分工中，台灣工廠的定位與技術創新；日本液晶面板業人才流到台灣，台灣半導體人才流到大陸；台商外移大陸的創業經營模式、進一步向

內地遷移、中國與台灣的政經糾結等。第三，本書探究了新的課題，如：家族集團企業的形成、股權結構與運作，及其在台灣整體經濟中的角色與變遷；台灣股市的形成、變遷與特色，以及其與台灣經濟變遷的關係；人口的教育與年齡組成如何影響了勞動力的供給；以及資本主義之外的另類可能。與此相關的是賦予舊課題新意涵，如：中小企業的分散型生產網絡在附加價值的創造上與大型企業平分秋色，而且有助於技術學習與創新。最後，本書落實跨領域的結合，將階層與勞動研究引入經濟社會學，處理了薪資的性別差距、剝削的類型與測量、勞工運動在勞動力「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的影響等。

要言之，本書各篇論文勾繪了從 1990 年代以來的經濟現象，激發了我們對於這個現象的好奇：是什麼樣的動力促成了這樣的現象？底下擬從學術研究的觀點，特別是以經濟社會學的角度來提出幾點淺見，期能促發更深入的討論。

(二) 切磋

1. 未竟的奇蹟：企業大型化與台灣經濟衰退

本書兩位編者的主要論點是台灣經濟從 1990 年代以來逐漸衰退，由「奇蹟典範」轉變為「衰退典範」，意味著 1970 年代以來的台灣經濟奇蹟不再，本書的書名《未竟的奇蹟》即是這個論點的展現。在現象層次，〈進擊的巨人：台灣企業規模迅速成長的原因與後果〉主張台灣的企業規模在 2004 年之後逐漸擴大，中小企業的純益率、出口產值減少，創業率、存活年數都下降，大企業「壓迫本土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林宗弘、胡伯維 2017: 230, 243-247)，加上大型化的企業外移，導致了台灣經濟衰退。在導論章中，兩位編者指出：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大型化、家族化的集團企業，成為經濟活動的主力，經濟起飛時由中小企業撐起半邊天的圖像，也越來越模糊」(李宗榮、林宗弘 2017b: 8-9)。

在概念與理論層次，這篇導論更以「衰退典範」來描述台灣在

1990年代以後的發展，涵蓋了貿易政策、國家角色、產業結構、金融制度、社會流動、性別家庭與人口、政治衝突與社會分化等各方面的變遷。

我們先在現象層次進行切磋。〈進擊的巨人：台灣企業規模迅速成長的原因與後果〉（林宗弘、胡伯維 2017）的衰退論包含兩個論點：（1）台灣經濟在 2000 年起企業逐漸大型化並外移，導致了台灣經濟的衰退；（2）在台灣經濟發展中大企業的角色逐漸吃重，中小企業的角色逐漸式微，由中小企業構成的網絡式生產組織在過去支撐台灣經濟奇蹟，現已不再發揮作用。

針對第一個論點，本書的〈從頭家島到隱形冠軍：台灣中小企業的轉型，1996-2011〉很明確地指出：這只適用於台灣的資訊電子業，並非台灣經濟的全貌。該文的證據是：（1）資訊電子業持續大型化與集中化，但機械製造業仍是以小企業為主體；（2）外移的主要是資訊電子業（特別是電腦和週邊設備），他們是透過台灣接單、海外生產出口，大量購買中間投入品，從而在台灣創造的產量總值與附加價值大幅減少（謝斐宇 2017: 355）。如果只從電子資訊業來看，台灣經濟確實有衰退的跡象，但是台灣的經濟並不只有電子資訊業。

再者，就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在台灣經濟發展中的角色而言，這篇文章分析了產業所創造附加價值，發現金屬機械產業對整體製造業的貢獻不下於資訊產業。以 2011 年為例，電腦與週邊設備業的營收佔製造業營收的 26.5%，但卻只創造了製造業附加價值的 5.6%。相對地，機械製造業的營收佔全體製造業的 22.1%，但卻創造出整體製造業 26.9% 的附加價值（謝斐宇 2017: 354）。

這篇文章也以自行車業、汽車零件業與工具機業為例，指出兩個持續支持台灣經濟面對全球化挑戰的微觀運作機制，一是中小企業為基礎的分散化結構，二是多元化出口導向和直接出口零件的能力。在這種以全球市場為導向的關鍵零組件生產中，分散型的網絡生產組織提供了來自現場實作的技術學習與創新，以及不同企業與部門之間

的交流，加上公共研發機構（如金屬研發中心）回應分散型生產網絡的集體需求，讓這個體系可以因應全球產業變遷的挑戰。該文的重要結論是：「產業結構逐漸集中化以及被大型企業支配的宣稱，只適用於資訊科技部門」，以及「許多中小企業持續以分散化的產業體系模式運作」（謝斐宇 2017: 356）。簡言之，這篇文章逐一反駁了李宗榮、林宗弘（2017b）的大型化論與衰退論。

我們也可以用〈進擊的巨人：台灣企業規模迅速成長的原因與後果〉所呈現的資料來挑戰中小企業式微的論點。以中小企業平均存活年數來說，存活 1 到 5 年的中小企業比例從 1995 年到 2012 年逐漸下降，但是存活 20 年以上的逐漸從低於 10% 增加到 20% 以上（林宗弘、胡伯維 2017: 247），這數據呈現早夭的中小企業比例逐漸下降，而長壽的中小企業比例逐漸增加，意味著中小企業的韌性增加，而不是式微。

其他學者的研究也支持上述的論點。鄭陸霖（2006）以台灣汽車產業為例，指出「幻象之後」的實況。成車與零組件產出在 2001 年進入 WTO 之後，並沒有如預期的萎縮，反而不斷成長：「製造組裝、設計開發與行銷實力逐步提升，支援海外擴張、擴大國際合作，甚至反向投資日本技術母廠」（鄭陸霖 2006: 124）。他以「跨界產業場域」中台灣廠商在母廠控制下的學習（「學習—控制的雙元辯證」）來說明這個動力。

十年後，劉清耿（2016）分析了一家生產汽車安全氣囊。這家位於彰化伸港工業區的企業，原本生產車門板、方向盤、座椅等，後來投入安全氣囊領域的技術學習，目前專精於安全氣囊模組，包括了單項組件、氣囊模組與系統規劃。但受限於原來的汽車代工體系，這家企業無法打入日系或美系汽車生產鍊，只好向其他市場發展。這家廠商是馬來西亞第一大車廠 Proton 及第二大車廠 Perodua 的一階供應商（Tier 1），從新車開發階段就參與被動安全系統的規劃。英國蓮花（Lotus）跑車在前座的安全氣囊也是這家廠商所提供。原來的代工體制孕育了創新與擴展的可能，但同時代工體制也限制了這種潛力，

台灣的中小企業只能在代工體系控制之外的國際市場找尋出路。換言之，在 1990 年代之後仍然有許多「奇蹟典範」下的創新與成長。¹

小結來講，台灣經濟從 1990 年代以來的衰退是局部的，部分產業（汽車成車與零件）仍然有創新與成長，以及中小企業的韌性增加。這意味著我們必須適切地定位衰退，才有機會以整體的觀點來同時考察衰退與成長。

換句話說，作為「衰退論」立論基礎的電子資訊業，只是整體圖像中的一個拼圖，如果將其他拼圖（例如機械製造業或汽車業）納入，看到的可能不是衰退，而是韌性、活力與創新。我們甚至可以推論：資訊電子業的大型化與外移，影響了台灣經濟的發展，所幸靠著製造業其他部門中由中小企業構成的分散型生產網絡的創新與韌性，讓台灣經濟有能力面對全球化的挑戰。

讓我們再看看本書其他各篇論文與衰退論的關係。

2. 本書各篇論文與衰退論的關係

本書各篇論文可以分成三類：支持衰退典範、反對衰退典範、與衰退典範無關。支持「未竟的奇蹟」的「衰退典範」論的有 2 篇（〈「台灣製造」的崛起與失落：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經濟社會學〉與〈進擊的巨人：台灣企業規模迅速成長的原因與後果〉），不支持的有 4 篇，與「衰退典範」無涉的論文有 13 篇。

〈從頭家島到隱形冠軍：台灣中小企業的轉型，1996-2011〉援引工商普查的資料反駁企業大型化與台灣經濟衰退的論點（謝斐宇 2017）；〈漁翁得利：台灣筆記型電腦代工廠的學習機制〉指出了台灣企業的傑出學習能力得以在國際市場上立足（川上桃子 2017）；〈產業浪人：日本科技人才遷移到台灣的過程〉則發現台灣產業有來自日本的人才協助（田島真弓 2017）；〈台灣經濟轉型中小型家庭企業的夫妻夥伴關係與性別動力：女性賦權的探討〉指出了中小型企

1 為什麼「衰退論」看起來佔上風？這就涉及了經濟生活與資本主義如何被再現，可能的因素包含了：個體感受與總體現象間的可能分歧、指標與資料庫的選擇、各種媒體的偏好等。謝謝鄭瑋寧教授點出這個重要的問題。

業來自家庭關係的韌性（呂玉瑕、林庭萱 2017）。這四篇論文其實是在告訴讀者：台灣經濟成長的動力仍不可忽視。

大部分的論文與「未竟的奇蹟」或「衰退論」無涉。舉例而言，與所謂造成「衰退」的企業大型化有關的有〈台灣家族集團股權結構的變遷：制度環境與組織擴張的影響〉（鍾喜梅、詹淑婷 2017）與〈家族資本主義的興起與鞏固〉（李宗榮 2017），但家族企業與「奇蹟」或者「衰退」的關係並非這兩篇論文的重點。再如〈自由化、資本形成與股票市場：一個經濟社會學的分析〉（鄭力軒 2017）探討了台灣股市的變化，但並未論證這個變化與「奇蹟」或「衰退」的關係。〈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剝削情況：以台灣製造業為例的實證分析〉（劉正等 2017）亦未討論：剝削到底造成「奇蹟」或是「衰退」？而〈另類經濟模式的比較與探討：台灣的經驗〉（陳東升 2017）關注的問題更是在「奇蹟」或者「衰退」之外。

這 13 篇論文與「奇蹟」或「衰退」有著各種可能的關係，僅僅收錄這些文章，將其安置在名為《未竟的奇蹟》的書中，並不會自動就呼應書名《未竟的奇蹟》或者支持本書導論章的衰退論（李宗榮、林宗弘 2017b）。但這不意味這些論文無助於我們理解 1990 年代以後台灣經濟衰退或停滯的事實。增進理解的具體作法有三，一是扣緊「由成長到衰退」的核心議題，二是發展出更為適切的分析架構，三是以新的分析架構重新檢視本書各篇論文的貢獻。

如果能回到「台灣經濟是否由成長轉變為衰退」的核心課題，檢視各章對於這個課題意涵，將有助於我們整體掌握台灣經濟的變遷。舉例而言，本書各章所探討的股市性質變遷、家族集團企業、中小企業中的家庭動力、科技業的創新、技術人才的跨國流動、剝削、勞工運動、台商外移至大陸（及其彼此的互動）等，是否以及如何帶來台灣經濟的衰退（或不衰退）？

另一個可行的途徑是發展出更適切的分析架構並以此來檢視本書各章論文的貢獻。本書導論章（李宗榮、林宗弘 2017b）與〈進擊的巨人：台灣企業規模迅速成長的原因與後果〉（林宗弘、胡伯維

2017) 之外的各章各有關注的焦點與發現，奇蹟或衰退並非其主要的重心，因此，「未竟的奇蹟」的「衰退典範」大概不是貫穿與整合全書各章的適切主軸。那麼可能的替代方案是什麼？

這就涉及該書所提出的「典範」概念。在導論章（李宗榮、林宗弘 2017b）中，兩位編者進一步將觀察到的現象重新概念化為從「奇蹟典範」到「衰退典範」的移轉。讓我們先就此做進一步的切磋。

3. 「典範」的移轉？

「典範」是學術分析的重要概念，本書導論章區分出兩個典範：「奇蹟典範」與「衰退典範」。前者試圖回答的問題是：台灣長期的高經濟成長率何以可能？後者要回答的問題是：為何台灣面臨經濟與社會的長期衰退？兩位主編條列了幾個因素：貿易政策、國家角色、產業結構、金融制度、社會流動、性別家庭與人口、政治衝突與分化（李宗榮、林宗弘 2017b）。有六點值得商榷。

首先，「奇蹟」與「衰退」是描述現象的常識性用語，「奇蹟」不是典範，「衰退」也不會是典範，學術研究必須先將它們括弧起來。二者都是現象與結果，不是「典範」，我們必須探究的是：造成這些現象與結果的機制與原因，並做進一步的概念化。

其次，即便暫時接受「奇蹟典範」與「衰退典範」的說法，那麼要問的是：真的有兩個典範，一個叫「奇蹟典範」，一個叫「衰退典範」？表面上看起來是兩個「典範」，但實際上就是一個問題：台灣經濟為何成長與衰退？這是依變項，而自變項則是上述的貿易政策、國家角色、產業結構、金融制度、社會流動、性別家庭與人口、政治衝突與分化。細究之下，本書導論章中所謂的「典範」，其實就是上述這個分析架構，因此，本書只有一個典範（意指分析架構），並沒有典範的移轉。導論章所勾繪的「衰退」，其實是所謂的「出口導向的發展典範」在 1980 年代末期所呈現出來的矛盾：工資上揚、外匯積累、台幣升值、資本外移等，這是同一典範的內部矛盾，而不是典範的移轉。

同樣地，本書導論章透過宏觀（國家、金融、人口）與微觀（大

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兩岸經貿、另類出路)來安排各章(李宗榮、林宗弘 2017b)。然而單單區辨分析的層次,無法呈現出台灣經濟作為一個整體的組合(configuration)及其內部的動力與矛盾,從而無法解釋「奇蹟」或者「未竟的奇蹟」。

第三,這個分析架構是本書的指引或結論?如果是指引,就必須說明為何選擇了這幾組因素當作自變項——是來自過去研究的成果、既有理論的推導、或是其他?如果是結論,那就必須說明如何從全書各篇論文的研究成果總結出這個分析架構。

第四,不論這個分析架構是導引或結論,都必須說明這幾組自變項與依變項的關係,但本書對此並未多做著墨。本書導論章中的表 1 條列了依變項(台灣經濟的發展與變遷)與自變項(貿易政策、國家角色、產業結構、金融制度、社會流動、性別家庭與人口、政治衝突與社會分化)(李宗榮、林宗弘 2017b: 10),兩位編者想要論證的是:各個自變項影響了依變項,從而解釋了台灣經濟由奇蹟到衰退的變化。但我們看到的只是列出這幾個自變項,與依變項並排,兩位編者並未進一步論證這些自變項與依變項的關係,更未說明本書各章論文的發現與依變項、自變項,以及二者之關係的可能連結。

更進一步,則需論證這些自變項間的關係,才能有效解釋依變項。條列諸要素並不能構成一個有內部動力的體制,只有一個具有內部動力的「體制」概念(來自各個自變項的連結與整合)才能掌握「典範」在此的一個核心意義:台灣經濟運作的一套原則。一個有趣的例子是表 1 的社會因素(社會流動、政治衝突與社會分化、性別家庭與人口),可能同時是台灣經濟成長與衰退的條件與後果,亦即可能同時是自變項與依變項。由於欠缺諸因素整合而成的一個「體制」概念,本書導論章的分析架構無法處理「社會因素既是自變項也是依變項」的弔詭。

第五,回到「典範」這個概念。常用的「典範移轉」,指的是理論觀點的轉變,如由現代化理論轉變為依賴理論或世界體系理論,或者更一般性地由功能論典範轉變為衝突論典範。由於本書將典範等

同於現象，將典範的變遷等同於現象的變遷，從而未能觸及此處典範的主要指涉：「台灣經濟運作的一套原則」，更遑論理論觀點或其轉移。本書對於「典範」概念的運用，並未發揮由現象到理論觀點、由表象到實在的深化作用。

最後，「典範」也涉及了價值預設。不論「奇蹟典範」或「衰退典範」，都指涉台灣在 1960 年代末期以來的經濟發展，包含了國家對經濟與勞資關係的管制、彈性的勞動力運用、付出環境成本等，而導論章稱之為「奇蹟」典範，並惋惜這個「奇蹟」典範在 1990 年代之後「未竟」（李宗榮、林宗弘 2017b）。從後設價值的觀點來看，是否可以更精準地稱之為「經濟發展至上典範」？學術上的命名，不僅有分析上的意涵，也有倫理上的意涵：我們還要使用這個「經濟發展至上典範」來構想台灣未來的發展嗎？是否有「經濟發展至上典範」之外的另類可能？

要如何做才能藉著「典範」與「典範的移轉」的引入來深化研究呢？停留在「現象的變遷」無法達成這個目的；反之，分支領域的轉型、提問的更迭、一般理論觀點的轉變等，才可能有助於我們達成深化的目標。一個具體可行的策略是「中層意義」的「典範」，也就是針對台灣經濟成長的機制與動力，提出一個模型來解釋。稍後會進一步申論。

為了準確對話，必須了解到底本書導論章所說的「奇蹟」典範的具體內容為何？如何運作？本書的「奇蹟典範」是導論章表 1 所條列的諸要素：貿易政策、國家角色、產業結構、金融制度、社會流動、性別家庭與人口、政治衝突與分化。兩位作者在每一個要素之後做了簡要說明，但如前所述，本書導論章並未說明這幾個要素間的關係，從而無法讓我們理解「奇蹟典範」如何運作，充其量我們只看到「奇蹟清單」。接著讓我們嘗試以既有的研究成果來勾繪所謂的「奇蹟典範」的具體內容與運作邏輯。

二、台灣經濟發展的各种說法

如何勾繪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的台灣經濟發展？浮現上來的關鍵字有：「經濟奇蹟」、「出口導向工業化」、「勞力密集」、「中小企業」、「家庭企業」（Hamilton and Boggart 1988）、「網路式生產組織」、「代工」、「外包體系」、「黑手變頭家」、「大有為政府」、「發展型國家」（Gold 1986; Wade 1990）、「中產階級興起」、「環境污染與自力救濟」、「工運風起雲湧」等。

如果以「經濟奇蹟」來描述，自然就會有奇蹟、衰退，從而「未竟」的推論。如果採取其他描述與分析，圖像與結論就會不同，就不會問奇蹟與衰退，也不會有「未完成的奇蹟」的說法，更不會有「奇蹟典範」與「衰退典範」的概念與二分。描述與概念化方式的不同影響了對現象扣問的深度、可能的答案以及未來的出路。「奇蹟」是一個常識性的描述性用語，學術研究必須立基在這個基礎之上做進一步的分析。因此，有必要檢視奇蹟之外的其他概念化方式。

上述每一個關鍵字代表了對台灣經濟發展不同的描述與概念化。以「出口導向工業化」來說，指涉了 1960 年代末期以來台灣的經濟發展是以國外消費市場為標的的製造業發展；「勞力密集」指涉的是生產過程中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中小企業」與「家庭企業」指的是生產單位；「網絡生產組織」指的是生產過程中的分工與合作，如勞動過程的可分割性與它所帶來的創業機會；「代工」指的是國外買主設計產品交由國內生產者製造；「外包體系」指的是發包者將訂單交由擁有生產工具的直接生產者製造，並按照勞動成果計酬的契約關係；「黑手變頭家」指的是在代工與外包體系下，受僱者創立小型工作坊的過程（與「中產階級興起」相關）；「大有為政府」指的是政府的產業、財稅、匯兌、進出口管制與勞工政策（被概念化為「發展型國家」）；勞工運動風起雲湧、環境污染與自力救濟則涉及了經濟發展的後果。

綜合上述，可以得到一幅整體圖像：從 1960 年代末期以來，透過外包網絡連結的中小企業擔綱了台灣經濟發展，他們替國外買主的訂單代工，在生產過程中持續發展技術「孤單項」（專精一項產品或零件，像是監視器中的測試器、車燈中的電鍍反射器、電容器中的絕緣膜等）、草根 R & D（仿冒、拆解「逆向工程」而來的領先製造方法，如車燈表面的無痕等）。除了製造出大量的成衣、鞋子、玩具、塑膠製品等出口外，外包網絡並且帶來了開設小型工作坊的機會，讓受僱者有機會以相對低的資本成為自營作業者或小頭家（謝國雄 1993）。相較於一般受僱者，自營作業者或者小頭家的收入較高，從而讓所得分配較為平均。因此，通稱為 1960 年代末期到 1980 年代的「台灣奇蹟」是由下面幾個要素所構成：出口導向、製造業、中小企業、外包網絡（網絡式生產組織）、草根的技術創新、黑手變頭家、較為平均的所得分配等，但這些要素也帶來了環境污染與勞工運動。

這些要素所構成的體制，其整體運作邏輯是：「事頭一頭家相互滋生」（層層細分工帶來了多樣的事頭，促發了各小型生產單位興起）、外包網絡中多樣的生產單位（發包者、代工廠、外包點、家庭代工）及彼此間在訂單上「吸納吞吐」、單位內部彈性、對市場的快速因應（如「搶氣」一搶在其他人之先生產市場所需要的產品或零件、多樣的生產項目等）、製造技術的創新，以及成本、利潤與風險之向下分攤等（Shieh 1992）。

如果上述的要素構成了本書導論章所謂的「奇蹟典範」，那麼要證明「奇蹟典範」已經式微（李宗榮、林宗弘 2017b），就必須進行兩項工作，一是逐一檢視上述各個面向是否在 1980 年代末期之後發生變化，二是分析由這些面向所構成的整體（「體制」）及其運作邏輯是否也發生了變化？由於導論章並未正面檢視這個「奇蹟典範」，從而無法朝此方向發展。

相反地，〈頭家島與隱形冠軍：台灣中小企業的轉型，1996-2011〉則持續探討這個「奇蹟」體制。該文發現，1990 年代以後的自行車、工具機、汽車材料等廣義的機械製造業為台灣創造的附加價

值不下於電腦資訊業。以中小企業為主的機械製造業有幾個特徵：互補與群聚的廣泛分工、以生產零件為主的層層外包體系、專業生產零組件但不依賴特定大廠商、來自生產現場實作與企業間互動的技術學習、公共研發機構創造業界的公共財以及直接出口（謝斐宇 2017: 349, 366-372）。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這個體系的常與變。中小企業組成的網絡式生產組織、現場實作的草根 R & D，以及不同業界的交流等，是技術與材料創新的來源，這是「常」；但是產品與市場則發生了變化。擔綱 1970 年以來的出口導向工業化的中小企業是以輕工業為主，負責由歐美廠商發包而來的產品中的一部份，而 2000 年後的外銷，主力則是機械製造業中的關鍵零組件，不再是組成國外特定品牌的最終產品的一部份，而是直接銷售到全球市場。關鍵零組件這個「無印良品」（no-brand key parts, NBKP）是台灣經濟轉型中的關鍵，而其生產是鑲嵌在分散型的外包體系之中。² 稍後會進一步論證分散型生產組織的常與變。

這裡的重點不在於「唱衰」或者「唱好」台灣的經濟發展模式，而是在於精準地對它重新概念化，並掌握它內部的動態發展。這裡的爭議，不僅是台灣企業大小規模相對變化，而是其背後的意義，如創造價值的所在、利潤發生的所在、利潤分享的機制、資本再生產與積累的模式、就業成長的模式、技術養成與傳遞的機制等。換言之，台灣企業規模大小變化之辨，是理解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關鍵。如能讓

2 《天下雜誌》以「變形蟲組織」來描述 1970 年代以來的中小企業生產組織：「佔九成比例的中小企業，以彈性應變、價格合理、隨時解決問題的速度與拚勁，織成一個縱橫連貫的變形蟲組織，成為世界生產分工體系中最有競爭力的一環」（蘇育琪 1993）。它接著以「隱形冠軍」來描述二十一世紀的台灣中小企業，如台中精密機械和自行車王國、高雄螺絲王國等，以及頂番婆水五金產業形成的工業聚落，每個聚落產值可達七百到一千億元：「上中下游彼此分工形成緊密的產業聚落，有人做五金加工、有人做零配件、電鍍……創造了專業分工、交期高彈性、產品能少量多樣的競爭力」（呂國禎、鄧凱元 2016）。2018 年 4 月 7 日以「變形蟲」、「隱形冠軍」與「中小企業」搜尋天下知識庫，發現「變形蟲」與「中小企業」的交集有 32 篇，佔「變形蟲」總篇數約四分之一；「隱形冠軍」與「中小企業」的交集則有 86 篇，約佔「隱形冠軍」總篇數的三分之一。這意味著不論在過去的「變形蟲組織」，或者現在的「隱形冠軍」，台灣的中小企業都舉足輕重。

這兩造做進一步切磋與辯論，使企業大小變化之辨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關鍵辯論，也可以成為本書的「招牌」貢獻。³

台灣在 1970 年代與 1980 年代的經濟蓬勃發展，正值歐美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由盛而衰，而台灣在 2000 年後的經濟難題，也與歐美資本主義在黃金時期之後另謀生路（新自由主義）有關。因此，必須將台灣經濟發展定位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史之中，而有關西方資本主義黃金時期的研究所發展出來的概念工具也可以為我們參考運用。

三、他山之石：西方資本主義「黃金時期」的「積累體制」與「調節模式」

從 1945 年到 1970 年代末期，西方的資本主義歷經了長時段（超過二十年）的穩定經濟成長率（持續 3% 到 5%）。經濟不斷成長，受僱者的所得不斷提高，社會福利制度也不斷完備，這個時期被稱為「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台灣從 1960 年代末期的出口導向工業化，就是拜黃金時期後期的危機之賜。

Andrew Glyn 等人（1991: 70-71）勾勒出了黃金時期的運作。首先，泰勒式的組織加上快速的機械化，大幅度提高了生產力。這在大量生產的持久消費品產業中特別顯著。其次，低度消費或不足的需求面問題，則經由持續提高的實質工資來解決；實質工資提高的速度足以提供充分的市場，但不會危及利潤的抽成（profit share）。第三，實質工資提高是來自：團體協商與福利國家保證了總體需求的成長、社會對這種發展型態有共識和工人的非正式參與。第四，對高利潤與不斷擴大的市場的期待讓廠商不斷投資。最後，上述民族國家內的經

3 美國二十世紀初的企業大型化，重點不僅僅只是在「大」而已，同時也涉及了企業內部組織、財產權與管理權的關係、利潤的分配、勞資關係、對公司本身的概念（是經濟體或社會體）、以及資本主義性質（如由威嚇到甘願）的變化等（Chandler 1977; Braverman 1974; Burawoy 1979; Ho 2009）。

濟是在一個美國主導創立的 IMF、IBRD、GATT 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運作，確保：匯率的穩定與各國收支平衡、國際投資、去除貿易障礙、戰後重建、初級商品的控制與充分就業。要言之，黃金年代的總體經濟呈現了「生產力的成長既與平均資本量的成長平行，也與實質工資的成長同步」（Glyn et. al 1991: 46-48）。這意味著：相當穩定的利潤率、消費與生產相當平衡的成長，從而讓最初的積累速度持續下去（Glyn et. al 1991: 48）。

關注資本主義的成長、危機與發展的調節學派（regulation school）據此發展出「積累體制」（accumulation regime）與「調節模式」（mode of regulation）（Boyer and Saillard 2002）。「積累體制」指的是「生產、所得分配與有效需求的創造」三者間的動態關係，如技術的創新、工作組織的變遷、實質工資成長與生產力成長的關係、投資與利潤的連動等。「調節模式」則是規約積累體制的制度性安排，包含了「工資—勞動」的連結（如決定薪資收入的因素）、競爭的形式、國家介入經濟的樣態（公權力、正當化的形式與課稅的形式等）、貨幣的形式（現金或者信用）、國際體制等。具體的例子是二次戰後在歐美國家所形成的福特式（Fordism）積累體制與調節模式。簡要地說，「積累體制」指的是資本的創造、繁衍與擴大，而調節模式指的是對這個過程的規約。

這四個因素的輻輳，促成了西方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福特主義」的積累體制與調節模式），而這四個因素的惡化與脫鉤，則帶來西方資本主義在 1980 年代以後的危機與式微，以及「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或通稱「新自由主義」的興起。

要言之，如果我們要準確地運用「典範」與「典範的變遷」來探討台灣的經濟變遷，「積累體制」與「調節模式」及其變遷可能是一個合適的選項。要問的不是：台灣經濟是否歷經了奇蹟式的發展或是奇蹟之後的衰退，而是：資本主義在台灣的積累體制與調節模式呈現了什麼樣的面貌？有什麼樣的變遷？變遷的動力與機制為何？

必需留意的是這個理論模式所適用的社會脈絡。首先，積累體制

與調節模式是為了解釋戰後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史的黃金時期（大約是1945年到1979年之間），而台灣是搭上這個黃金時期的中後期。其次，積累體制與調節模式的制度條件是高生產力、工會與資方的團體協商制度、福利國家以及美國霸權主導的世界體系，台灣欠缺這些制度條件。然而，這兩個概念所涉及的是資本主義的普遍性要素，可以運用到台灣個案進行雙向的切磋：一方面檢視這個架構的適用性，一方面突顯台灣個案的特殊性，進而創造與此架構切磋的空間。

最好的檢驗是將這樣的概念架構用來考察台灣經濟發展與所謂的「未竟的奇蹟」，看看是否能帶來一貫、適切、且更深入的詮釋。本文接下來的兩節即是在做這樣的嘗試。第四節嘗試以積累體制與調節模式的概念來統整台灣經濟發展部分的研究成果，第五節則嘗試以這樣的概念來考察本書各篇論文的可能貢獻。前者呈現的是運用這兩個概念讓台灣經濟發展的部分研究成果有了一個整體與一貫的面貌，而後者則指出了本書在這個圖像的新貢獻。

四、重新概念化： 從資本主義看台灣後經濟發展

如果將戰後台灣的經濟發展放在台灣資本主義發展史的角度來考察，可能會帶來新的理解。而在考察資本主義發展史各個傳統中，調節學派發展出來的「積累體制」與「調節模式」是可以嘗試的道路。

從這個觀點來探究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研究有待開展，我沒有全面而深入的答案，底下只是立基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上，試圖勾繪出初步圖像的嘗試。

(一) 「外包積累體制」與「純勞動調節模式」：1960 年代末期至 1990 年代

盤點上述有關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故事中，可以發現「勞力密集」、「中小企業」、「網絡生產組織」、「代工」等可歸為創造價值的生產體系，中產階級的興起與勞工運動則涉及了「生產—消費—投資」的社會（階層）表現，這些都構成了積累體制。中小企業林立涉及了競爭的形式，「出口導向」涉及的是國際體系，環境自力救濟則涉及了對資本積累的回應，這些構成了調節模式。

讓我們聚焦在外包體系。首先，外包是一種勞動過程中的分工與合作的關係，發包者與承包者在完成一個產品的過程中，各自負責不同的工作，如訂單的分配與工作的安排（家庭代工、外包點、代工廠、貿易商等）等創造價值的機制，可以歸為積累體制。

其次，外包體系也涉及了創造出來的價值分配：完成一件產品並售出後的所得，由發包者將其中的一部分分配給承包者，如微觀層次的按件計酬與「純勞動」（按件計酬所帶來的「有做有錢，沒做沒錢」）的「工資—勞動」連結，以及宏觀層次的因為較為分散的財產權帶來的較為平均的勞資因素分配。這是立基在財產權獨立的前提而來，其成果分配就比純粹的薪資勞動較為對等，從而具有「生產合作社」的要素。前者屬於調節模式，後者屬於積累體制。

第三、外包體系同時也指涉了：契約關係（外包是一種契約關係，發包者與承包者約定，將特定的事頭委託承包者來完成，後者由此取得報酬）與財產權關係（發包者與承包者各有不同的生產工具，且各自所有），二者都屬調節模式的一環。再者，外包體系連結了在地多樣的生產者與國際的發包商，是被整合進入國際體系的一個樣態，從而涉及了調節模式。延伸來看，外包體系也連結了家庭生產模式與資本主義，可判屬積累體制。

因此，1960 年代末期之後台灣資本主義式的經濟發展，或可用「外包積累體制」（連結生產、所得、分配、資本動態發展）來形容，而其調節模式或可以用其特別的「工資—勞動」連結來形容而命

名為「純勞動調節模式」。⁴

現在的問題不是台灣經濟發展的奇蹟是否衰退或者未竟，而是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的「外包積累體制」與「純勞動調節模式」是否有內部的張力與矛盾、是否發生了變化？

（二）「外包積累體制」與「純勞動調節模式」的變遷

從 1970 年代的輕工業，到 1990 年代的機械加工業，再到半導體業，都可以看到外包邏輯的運作，只是三者產出（最終商品直接出口、零組件併入最終商品出口、關鍵零組件作為最終商品直接出口）、相對規模（承包廠小或是大）、技術（依賴或者主導）有差別。

進一步問，從 1990 年代以後，「外包積累體制」與「純勞動調節模式」發生了什麼變化？有幾個可能：（1）輕工業整個外移，將整個外包體系連根拔起；（2）電子資訊業的外移，其效果類似輕工業（整個外包體系被拔起）；（3）機械製造業仍以外包體系來運作，且將關鍵零組件直接外銷；（4）服務業興起，以連鎖超商為例，總部與底層加盟分店的關係仍是外包，但大企業總部壟斷，底層的加盟店之間則是完全競爭，但後者所得相對減少（吳偉立 2010）。

除了第三項外，其餘三個發展對台灣經濟帶來的影響都是負面的：積累體制中「所得分配給工資」的比例減少（長期低薪資是一個例子），「生產力—利潤—工資—投資」的正面循環無法形成，有別於前期。

4 每個概念都有其強項，也有其限制，我們要選擇最能涵蓋關鍵機制與最全面的概念。夏傳位（2015）將 1960 年代末期以來的台灣資本主義定性為「外銷導向積累體制」，國內的生產繫之於核心國家的最終消費，內在的矛盾與衝突來自於「積累過剩與消費不足」。「新自由主義積累體制」的特徵則是金融化：資本的積累與生產脫鉤、股東利益至上，股票市值為唯一的判準。他並且確立 2003 年是由「出口導向積累體制」邁向新自由主義積累體制的轉捩點。相較於以出口為觀察重點的「外銷導向積累體制」，「外包積累體制」與「純勞動調節模式」凸顯的是台灣資本積累體制與調節模式的內部動態：資本從何而來、如何積累、受何種內部因素調節等面向，但二者同樣都關注：產出、工資、利潤、消費與資本積累的動態關係與整體。

就「純勞動調節模式」而言，原來在外包體系中的按件計酬方式，以更極端的方式展現在非典型就業（部分工時、臨時工、人力派遣等），也就是「勞動成果」的「純勞動」，轉變為「勞動力本身」的「純勞動」，讓勞動力的商品化更為徹底，從而深化了「純勞動」的「勞動—工資」連結模式。這是從另一個角度解釋台灣長期的低薪現象。

要言之，「外包積累體制」與「純勞動調節模式」可以更準確地掌握台灣戰後經濟發展與變遷的動力與機制。

五、再看一次： 《未竟的奇蹟》各篇論文的貢獻

從這個觀點來看，本書各章論文在理解台灣資本主義的積累體制與調節模式上都做出了貢獻。

〈從頭家島到隱形冠軍：台灣中小企業的轉型，1996-2011〉（謝斐宇 2017）、〈漁翁得利：台灣筆記型電腦代工廠的學習機制〉（川上桃子 2017）、〈產業浪人：日本科技人才遷移到台灣的過程〉（田畠真弓 2017）與〈紅色跨界創新網絡的機制：以中國大陸半導體公司專利發明人網絡為例〉（熊瑞梅等 2017）指出了外包體系的持續與技術上的創新，而技術創新是積累體制的一個要素。此外，〈台灣經濟轉型中小型家庭企業的夫妻夥伴關係與性別動力：女性賦權的探討〉則發現了外包體系中小企業內部的動力（呂玉瑕、林庭萱 2017）。〈漁翁得利：台灣筆記型電腦代工廠的學習機制〉、〈產業浪人：日本科技人才遷移到台灣的過程〉、〈台商轉進：跨地理移動下的中國大陸台資工廠〉（鄧建邦 2017）與〈鑲嵌的極限：中國台商的「跨國資本積累場域」分析〉（鄭志鵬、林宗弘 2017）細緻地指出了日本資本進入台灣，台灣資本再流動到中國大陸的過程及其所帶來的後果。這涉及了積累體制較少處理的「資本流動」，未

來可以進一步探究資本的流動如何影響外包積累體制與純勞動調節模式。

就資本的形式而言，〈自由化、資本形成與股票市場：一個經濟社會學的分析〉（鄭力軒 2017）指出台灣的資本市場由銀行、散戶再到外資法人主導的演變，並發現 1985 年到 2000 年散戶的形成，讓電子業的分紅配股、集團企業的多角化及國營事業的民營化成為可能。同樣地，〈台灣家族集團股權結構的變遷：制度環境與組織擴張的影響〉（鍾喜梅、詹淑婷 2017）與〈家族資本主義的興起與鞏固〉（李宗榮 2017）也分析了資本的性質與形式的變化。資本的形式之變遷如何影響了積累體制與調節模式，是未來值得探索的課題。

就純勞動調節模式而言，〈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剝削情況：以台灣製造業為例的實證分析〉（劉正等 2017）指出了「工資—勞動」連屬的兩種樣態（「榨取剝削」為主，「移轉剝削」為輔），〈性別平等了嗎？男性和女性受僱者薪資差距解析〉（張晉芬 2017）發現了性別因素在薪資報酬上的影響，〈介於抗爭與協商：勞工運動在台灣的經濟社會學意涵〉（何明修 2017）則指出勞工運動在勞動力「去商品化」（也就是鬆動「純勞動」這個「工資—勞動」連結）上的意涵。此外，〈進擊的巨人：台灣企業規模迅速成長的原因與後果〉（林宗弘、胡伯維 2017）發現的企業大型化涉及了調節模式中的競爭樣態，〈台灣經濟發展中的國家角色：歷史回顧與理論展望〉（王振寰等 2017）與〈以商業模式作統戰：跨海峽政商關係中的在地協力者機制〉（吳介民 2017）則分析了調節模式中的國家介入的樣態。一方面，世界經濟體系對台灣的影響力由美國、日本而移向中國，另一方面，台灣經濟由台灣國家的調節，轉變為台灣與中國這兩個國家的調節。台灣與中國的特殊關係，使得台灣在國際上成為一個「主權受挑戰國家」（a contested sovereign state），有系統地考察「主權受挑戰國家」對於台灣資本主義發展與變遷的影響（如對資本運作、積累體制與調節模式的影響），都涉及調節體制中的國家與國際體制的角色。

〈少而精的勞動力：老化社會人口教育結構的重要性〉指出積累體制與調節模式沒有涵蓋的人口與勞動力（鄭雁馨 2017），〈另類經濟模式的比較與探討：台灣的經驗〉指出資本之外的另類可能（如合作社、社區經濟、社會企業等）（陳東升 2017），這些對資本主義的做工（work on capitalism），會對積累體制與調節模式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對資本主義做工是一種對抗資本主義的社會自我保護運動，可以讓我們超越積累體制與調節模式的概念化方式。⁵

要言之，本書導論之外的各章論文除了例證積累體制與調節模式的關鍵概念（如積累體制中的技術要素、「工資—勞動」連結、競爭的樣態等）之外，也揭露了台灣積累體制與調節模式中尚未被處理的面向（如資本流動、資本形式的變遷、主權受挑戰國家、人口與勞動力等），讓我們得以更全面地檢視這些例證與面向和「外包積累體制」與「純勞動調節模式」的關係。

六、尋求突破： 發展、文化、實作與經濟

雖然外包積累體制與純勞動調節模式有助於理解台灣的經濟發展，未來有關台灣經濟發展的研究，仍然必需超越「積累體制」與「調節模式」，這可以從兩個方向來思考，一是反思發展社會學的核心關懷，二是向經濟社會學的晚近發展借鏡。

（一）發展社會學、經濟社會學與資本主義

從分支領域來看，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的研究先是出現在發展社會學，接著是勞動社會學，再來則是經濟社會學。發展社會學探討的

5 例如：「經濟生活由各種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的實踐與制度所構成」多樣性語彙（Gibson-Graham 2006），是否可能翻轉以資本主義經濟為焦點的「積累體制」與「調節模式」？

是資本主義在後進國家的發展及其所帶來的後果，台灣的學者則將勞動過程與勞動體制課題帶入發展社會學，接踵而來的經濟社會學則以「鑲嵌」的觀點探究台灣的經濟發展與變遷。相較於發展社會學與勞動社會學將資本主義當作研究標的，當前的經濟社會學則不再直接處理資本主義。

然而，經濟社會學的興起、發展與轉變，與資本主義的進程密不可分，有的經濟社會學將資本主義視為當然的預設，有的則將其當作背景，但甚少將其當作研究的對象。在古典的「經濟的社會學研究」中，馬克思（1990）以勞動力的買賣（勞動力商品化、薪資勞動）當作資本主義的定義性特徵，雇主汲取薪資勞動創造的剩餘價值，並將剩餘價值繼續投資，持續進行資本的積累。Karl Polanyi（1957[1944]）則在勞動力的商品化之外，帶入土地與交換媒介（貨幣）的商品化，認為自成一格的市場機制是現代社會經濟與政治危機的起源，並且預言一定會有保護社會免於市場不斷侵蝕的對抗運動持續興起。Polanyi（1957）更一般性的觀點則是指出人類社會分配資源的機制應該鑲嵌（embeddedness）在相應的社會組織，但實際的情況卻是：互惠是鑲嵌在對偶族的氏族組織，再分配鑲嵌在部落酋長制，唯獨市場交易與社會組織脫鉤，從而為近代的人類社會帶來了危機。二者都是以資本主義為探究標的的展現，其特徵採取整體觀來分析社會，聚焦在社會的核心制度之運作與後果，敏銳地勾勒其中的辯證性動力，以及戮力於標明當代社會的特徵。⁶

新經濟社會學帶來了「巨變」。Mark Granovetter（1985）創造了風靡學界的「鑲嵌」概念，看似 Polanyi，但意義完全不同。Granovetter（1985）的鑲嵌指的是個人的經濟行為受到人際關係的影

6 二十一世紀興起的「資本主義多樣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以公司為焦點，探討它們在制度設定的條件中如何進行策略性的互動以取得它們所需的資源。在檢視工業關係、職業訓練與教育、公司治理、公司間的關係，以及受雇者的關係等組合後，區辨出「自由市場經濟」（liberal market economy）與「協調式市場經濟」（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y）（Hall and Soskice 2001）。資本主義多樣性的研究打破單一同質化的迷思，指出了多樣的制度安排，從而點出了面對資本主義時的多種選擇，確有貢獻，但對於資本主義本身的運作邏輯存而不論，關注的只是公司如何取得資源。

響（如大陸台商必須運用政商關係來經營企業）。這樣的觀點固然可以修正經濟學原子論的人觀，但以資本主義為研究對象的古典的「經濟的社會學研究」所展現出來的整體觀、制度論、動力觀與歷史感，卻未獲得應有的重視。

當然，《未竟的奇蹟》中有三章展現了這樣的古典關懷。〈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剝削情況：以台灣製造業為例的實證分析〉將「剝削」操作化為所得與邊際生產力的相對比例，並以具體資料指出台灣製造業中的剝削十分普遍，75%的利潤來自廠商對勞動的剝削。〈介於抗爭與協商：勞工運動在台灣的經濟社會學意涵〉則指出了勞動基準法與大量解雇勞工保護法具有將勞動力去商品化的效應，採取的是 Polanyi (1957[1944]) 的觀點。⁷ 如前所述，〈另類經濟模式的比較與探討：台灣的經驗〉就是在探討資本主義之外的另類可能，值得正視。⁸

台灣未來的經濟社會學，可能要向古典的「經濟的社會學研究」看齊，將資本主義當作研究的對象，作為「攻堅」的目標，進而整合經濟社會學中各個課題的研究成果。

（二）文化轉向與實作轉向

調節學派的論點並非資本主義發展史研究的終點，而是有待超越的論點。我們不妨向晚近經濟社會學的發展借鏡，一是文化轉向（the cultural turn），二是實作轉向（the practical turn）。

經濟社會學的文化轉向，嚴謹、精彩地將文化帶入了經濟分析。Viviana A. Zelizer (2010) 指出「生命神聖無價」的信念阻礙了美國人壽保險業興起。壽險業鬆動並轉化「生命神聖無價」為「生命有價且神聖」：透過壽險，讓遺屬有所依靠，是一種社會的不朽，壽險從

7 在討論勞動力去商品化之前，應該先探討台灣勞動力商品化的實況，以及台灣勞動者的因應 (Shieh 1992; 謝國雄 1997; 2003; 2013)。

8 探討資本主義的另類可能的同時，需要同時掌握台灣資本主義實際運作的面貌，本文的「外包積累體制」與「純勞動調節模式」提供了一個暫時性的答案。知己知彼，方能制敵。

而有了神聖的意涵。Frank Dobbin (1994) 透過「秩序觀」、「效率觀」、「因果推論」、以及「行動者」等觀念來分析美國、英國及法國的產業政策，指出各國的特殊性，這些都是觸及「積累體制」與「調節模式」底層的各种預設。以台灣經濟發展的研究來說，「發展型國家」一直是一個核心議題，如果能將 Dobbin 的文化取向帶入，探究台灣發展型國家中經濟決策者的「秩序觀」、「效率觀」、「因果推論的方式」、以及「行動者觀」，將可以深化我們對台灣發展型國家的理解。

Karen Ho (2009) 分析二十世紀初以來的大企業與二十世紀末的股東價值至上的革命，帶來了對「公司」這個概念的衝擊（另見 Dore 1997）。在對台灣經濟生活的研究中，如果能正面探究台灣社會對「公司」的看法，那麼當前的企業大型化之辨將會有新的意義：台灣社會是將公司看成財產的組合（股東或者私人投資）、人群的組合（受僱者與管理者）或是各種社會利益（上下游廠商、消費者、環境等）的組合？或者，透過一定比例的利潤公共化而來的「社會企業」，也涉及了我們對「公司」的想像，從而拓展了對於資本主義另類可能的想像。「公司」是積累體制的擔綱者，也是調節模式規約的對象，對公司的另類概念化，自然會帶來對積累體制與調節模式以及台灣經濟生活的新理解。

「市場」是另一個可從經濟生活內部嚴謹地檢視其文化內涵的例子。晚近的經濟社會學將倫理的面向帶入經濟生活的一個核心範疇——市場的討論之中，像是將各種隱藏在市場描述與分析背後的倫理價值搬上檯面來檢視，如市場是文明化的力量、市場是摧毀人類的惡魔、市場的力量微弱不足為善作惡、市場是一種科學與倫理的計畫等（Fourcade and Healy 2007）。

對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來說，「市場」一直是一個核心範疇，「尊重市場機制」是官員與企業家常用的說詞，但是這個「市場」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市場？是 Polanyi (1957[1944]) 抽象的自行運作、不受規律的市場機制，還是具體的傳統零售市場？是理想的完全競爭市

場，或是實存的寡佔或壟斷市場？是僅僅指涉資源分配，或是帶有上述的倫理面向？是作為動員資源的市場理想，還是正當化既有利益的意識形態實作？針對上述幾個問題的答案，深刻地影響了我們對台灣經濟生活的理解。帶回倫理，可以將「積累體制」與「調節模式」安置在不同的層次，不僅是經濟社會學，也是社會學本身的關鍵課題，藉此深化我們對台灣經濟生活的研究。

過去有關台灣經濟的社會學研究，也已經嘗試探究台灣經濟生活的文化面向，例如工資範疇的文化詮釋（展現在如「純勞動」）（謝國雄 1997；2003）、工資範疇與在地理解範疇的連屬（謝國雄 2003；2013）、經濟決策典範的正當性（夏傳位 2015）、汽車安全中對生命的評價（劉清耿 2016）等，都是直接捕捉經濟的各種範疇（「勞動」、「經濟」、「市場」等）的文化意義的努力，並且緊扣著「外包積累體制」與「純勞動調節模式」。

經濟社會學的文化轉向，在台灣學界激起了迴響，〈「台灣製造」的崛起與失落：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經濟社會學〉留意到了這個發展趨勢，例如文中提到「這類研究值得鼓勵，也有助於回應奇蹟典範裡被遺忘的儒教文化與身份認同等主題」（李宗榮、林宗弘 2017b: 29）。但這種處理「文化」的方式值得商榷，一是在所謂「奇蹟典範」的研究中，文化真的被遺忘了嗎？二是文化就是「儒教文化」與「身份認同」而已嗎？上述台灣經濟社會學的文化轉向所深入處理的「產業政策的思考架構」與「公司」、「市場」、「工資」等範疇，準確而紮實地呈現了經濟的文化面向。最後，在鼓勵對文化進行研究之後，要如何將文化準確地安置到本書的分析架構（李宗榮、林宗弘 2017b: 10）之中？再一次，上述台灣經濟社會學的文化轉向揭示了一個整合經濟與文化的途徑。

對於文化與經濟的關係，我們應該超越「呼籲」或者「說了就走」的階段，必須對「文化」的常識性理解保持警覺，並且正視「文化」的各種意義，進而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之上精益求精。藉此，我們才能踏實地打開經濟生活中「文化」這個黑箱，進而讓調節學派的

「積累體制」與「調節模式」有創新的意涵。

另一方面，晚近經濟社會學出現了實作轉向，強調「經濟」是「做」出來的，因此必須探究：各種測試與驗證、經濟物件如何透過特定的度量與語言而變成可計算、經濟學知識如何讓經濟生活成真、經濟生活的基礎設施等，如計算價格的工具、競爭的安排、辨識與分配利潤的會計方法（Muniesa et al. 2007）。這是向下深挖到資本主義的積累體制與調節模式的基礎設施的研究方向，值得嘗試。夏傳位（2017）有關國際會計金融準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 Standard, IFRS）的研究就是一個例子。為了促進資本的國際流動，IFRS 以市價取代成本，以「綜合損益」取代營收損益，以「公司作為投資組合」的概念取代「公司作為法人實體」的概念。這個表面上看起來中性的會計技術，卻連嚴格管制金融的發展型國家（如台灣）的財經官僚都志願擁抱，從而替金融化（新自由主義的核心運作）的積累體制與調節模式打下基礎。

本書導論章主張台灣經濟發展是由「奇蹟典範」蛻變為「衰退典範」。藉著本書的出版，本文除了在現象上提出挑戰之外，並且重新檢視有關台灣經濟發展的研究成果，嘗試提出不同的論點，一是以外包體系為主的分散型生產體系之常與變來重新詮釋，二是將台灣經濟發展史當作世界資本主義發史的一環，進而以「外包積累體制」與「純勞動調節模式」的變遷來理解這個進展，最後則借鏡經濟社會學的晚近發展來超越資本積累體制與調節模式的概念化。⁹

9 本文的「超越」指的是重新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意指對某個現象、既有的概念或者觀點提出新的看法。本文所舉的例子，雖然不是對「積累體制」或者「調節模式」直接提出新的觀點，而是檢視讓積累體制或者調節模式得以成立的諸要素（「國家」、「企業」、「市場」、「工資」、各種經濟度量的基礎等），一旦我們對這些要素有深入或者另類的理解（所謂的「深化」），那麼立基於其上的積累體制與調節模式就會有新的意義。在此，「超越」就呈現了學術原創性。以實作取向對於基礎設施的重視來說，基礎設施創造了各種經濟資料、現象與事實，雖然與驗證積累體制與調節模式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卻是我們論證與詮釋各種經濟事實的基礎。因此，重新概念化帶來不僅僅是「質疑」、「挑戰」或「補充」而已，而且可能是造成「豬羊變色」的觀點深化與轉變。觀點的深化與轉變將帶來學術的革命。台灣社會學強調解釋現象的理論（或對理論的挑戰），但在實作上卻是因為對「族群」、「性別」、「國家」、「工資」等的重新「概念化」深化了我們對台灣社會的理解（謝國雄 2008），

本書集結了台灣中生代社會學家在經濟社會學上的耕耘成果，已經引起了學界與社會的關注，本文拋磚引玉，期能激起對台灣經濟發展與變遷的理解的進一步辯論。

誌謝：夏傳位教授與劉清耿博士對本文的最初版本，鄭瑋寧教授對最後版本，提出深入的評論；兩位審查人精闢的意見以及編委會兩次十分中肯的建議，有效地協助作者釐清本文主要的論證；林靜怡小姐與蔡嘉信先生協助本文的編校。對此深深致謝，所有不足與責任，仍然在作者。

參考文獻

- 川上桃子，2017，〈漁翁得利：台灣筆記型電腦代工廠的學習機制〉。頁 49-88，收入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王振寰、李宗榮、陳琮淵，2017，〈台灣經濟發展中的國家角色：歷史回顧與理論展望〉。頁 49-88，收入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田嶋真弓，2017，〈產業浪人：日本科技人才遷移到台灣的過程〉。頁 541-570，收入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何明修，2017，〈介於抗爭與協商：勞工運動在台灣的經濟社會學意涵〉。頁 125-158，收入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吳介民，2017，〈以商業模式作統戰：跨海峽政商關係中的在地協力者機制〉。頁 675-719，收入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吳偉立，2010，《血汗超商：連鎖加盟如何變成連鎖枷鎖》。台北：群學出版社。
- 呂玉瑕、林庭萱，2017，〈台灣經濟轉型中小型家庭企業的夫妻夥伴關係與性別

這裡的重新概念化包含了嚴謹地建構研究對象，例如反思社會學的思考工具、與常識斷裂、整合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與存在論，藉以勾勒台灣社會的整體圖像（謝國雄 2011: 372-379）。重新概念化可以延伸到社會學的基本議題，如結構／能動（謝國雄 2015）。

- 動力：女性賦權的探討》。頁 383-424，收入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呂國禎、鄧凱元，2016，〈農地上的世界冠軍卻是違章建築〉。《天下雜誌》，611 期，11 月 23 日。
- 李宗榮，2017，〈家族資本主義的興起與鞏固〉。頁 313-344，收入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李宗榮、林宗弘編，2017a，《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李宗榮、林宗弘，2017b，〈「台灣製造」的崛起與失落：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經濟社會學〉。頁 1-43，收入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林宗弘、胡伯維，2017，〈進擊的巨人：台灣企業規模迅速成長的原因與後果〉。頁 229-266，收入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夏傳位，2015，《台灣的新自由主義轉向：發展型國家的變異與挑戰》。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2017，〈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會計作為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的渠道〉。頁 75-116，收入黃應貴、鄭瑋寧編，《金融經濟、主體性、與新秩序的浮現》。台北：群學出版社。
- 張晉芬，2017，〈性別平等了嗎？男性和女性受僱者薪資差距解析〉。頁 159-188，收入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馬克思（Karl Marx）著、吳家駟譯，1990，《資本論》，第一卷。台北：時報文化。
- 陳東升，2017，〈另類經濟模式的比較與探討：台灣的經驗〉。頁 571-605，收入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熊瑞梅、陳冠榮、官逸人，2017，〈紅色跨界創新網絡的機制：以中國大陸半導體公司專利發明人網絡為例〉。頁 495-540，收入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劉正、Arthur Sakamoto、蘇國賢，2017，〈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剝削情況：以台灣製造業為例的實證分析〉。頁 425-462，收入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劉清耿，2016，《把生命交給市場：台灣汽車安全技術中的政治、市場與文化》。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鄧建邦，2017，〈台商轉進：跨地理移動下的中國大陸台資工廠〉。頁 645-674，收入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鄭力軒，2017，〈自由化、資本形成與股票市場：一個經濟社會學的分析〉。頁 89-124，收入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鄭志鵬、林宗弘，2017，〈鑲嵌的極限：中國台商的「跨國資本積累場域」分析〉。頁 611-644，收入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鄭陸霖，2006，〈幻象之後：台灣汽車產業發展經驗與「跨界產業場域」理論〉。《台灣社會學》11: 111-174。
- 鄭雁馨，2017，〈少而精的勞動力：老化社會人口教育結構的重要性〉。頁 189-223，收入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謝國雄，1993，〈事頭、頭家與立業基之活化：台灣小型製造業單位創立及存活過程之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5: 93-129。
- ，1997，《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
- ，2003，《茶鄉社會誌：工資、政府與整體社會範疇》。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編），2008《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台北：群學出版社。
- ，2011，〈百年來的社會學：斷裂、移植與深耕〉。頁 349-385，收入《中華民國史：學術發展》。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暨聯經出版社。
- ，2013，《港都百工圖：商品拜物教的實踐與逆轉》。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2015，〈為什麼要重新概念化「結構與行動」？《港都百工圖》的例子〉。《台灣社會學刊》56: 199-217。
- 謝斐宇，2017，〈從頭家島到隱形冠軍：台灣中小企業的轉型，1996-2011〉。頁 345-382，收入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鍾喜梅、詹淑婷，2017，〈台灣家族集團股權結構的變遷：制度環境與組織擴張

- 的影響》。頁 267-311，收入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蘇育琪，1993，〈變形蟲組織：看不見的優勢〉。《天下雜誌》，143 期，4 月 1 日。
- Boyer, Robert and Yves Saillard, eds. 2002. *Regulation Theory: The State of the Art*. London: Routledge.
- Braverman, Harry. 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Burawoy, Michael.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andler, Alfred D., Jr. 1977.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obbin, Frank. 1994. *Forging Industrial Policy: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France in the Railway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ore, Ronald. 1997 “The Distinctiveness of Japan.” Pp. 19-32 in *Political Economy of Modern Capitalism*, edited by Colin Crouch and Wolfgang Streeck. London: Sage.
- Fourcade, Marion and Kieran Healy. 2007. “Moral Views of Market Socie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3: 285-311.
- Gibson-Graham, J. K. 2006 *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Glyn, Andrew, Alan Hughes, Alain Lipietz, and Ajit Singh. 1991.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olden Age.” Pp. 39-125 in *The Golden Age of Capitalism: Reinterpreting the Postwar Experience*, edited by Stephen A. Marglin and Juliet B. Scho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Gold, Thomas B. 1986.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 Gra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 481-510.
- Hall, Peter A. and David Soskice. 2001. “An Introduction to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Pp. 1-68 in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edited by Peter A. Hall and David Sosk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milton, Gary G. and Nicole Woolsey Biggart. 1988. “Market, Culture, and Author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Far East.”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upplement: S52-S94.
- Ho, Karen. 2009. *Liquidated: An Ethnography of Wall Stree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Muniesa, Fabian, Yuval Millo, and Michel Callon. 2007. "An Introduction to Market Devices."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55(2): 1-12.
- Polanyi, Karl. 1957[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 .1957.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Pp.243-269 in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Econom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 edited by Karl Polanyi, Conrad M. Arensberg, and Harry W. Pearson. Glencoe,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 Shieh, Gwo-shyong. 1992. *"Boss" Island: The Subcontracting Network and Micro-Entrepreneurship in Taiwan's Development*. New York: Peter Lang.
- Wade, Robert.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Zelizer, Viviana A. 2010. "Human Values and the Market: The Case of Life Insurance and Death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Pp. 19-39 in *Economic Lives: How Culture Shapes the Economy*, edited by Viviana Zeliz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